

收稿日期:2022-07-23

生态后现代主义的生成逻辑、理论意蕴及当代反思

吴燚盛, 陈云

(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生态后现代主义通过汲取怀特海过程哲学理论精髓、反思生态环境问题、参与生态女性主义运动,逐步形成一套独特的生态理论。生态后现代主义根植于整体主义生态思想,注重整体内部的和谐共生,培养对自然复魅的生生意识,探索以共同福祉为核心的生态经济学推进方案。生态后现代主义的某些观点对于建设生态文明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生态后现代主义的局限性客观存在,表现为浓厚的神学色彩、资本逻辑的思维桎梏和乌托邦式的未来预言。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应该作批判性反思,以便更加辩证和理性地看待生态后现代主义和其他具有相似特征的西方绿色思潮。

关键词:生态后现代主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文明;过程哲学;稳态经济

中图分类号:B089;X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2)06-0017-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现代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推进研究”(18CKS033)。

作者简介:吴燚盛(1998—),男,福建漳平人,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研究;陈云(1985—),男,江西宁都人,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与国外生态思潮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2.06.076

生态后现代主义亦称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是诞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绿色思潮之一,它旨在从建设性的视角去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并寻求解决之道,主要代表人物有小约翰·柯布、查伦·斯普瑞特奈克、大卫·格里芬和赫尔曼·达利等。生态后现代主义者坚持以生态视角来看待世界。他们主张对话式的交流和开放式的合作,尽管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具体措施上有些许不同,但都持有一个共同观点,即生态文明之路是实现人与自然共同福祉的基本途径。在当今中国倡导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我们究竟如何看待这股西方绿色思潮呢?鉴于目前学界对生态后现代主义的引介阐释有待深化,我们首先需要厘清生态后现代主义的生成逻辑,进而分析其理论的生态意蕴,并以此为基础对其作辩证反思。

一、生态后现代主义的生成逻辑

上世纪80年代,解构主义浪潮逐渐消退,美国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查伦·斯普瑞特奈

克提出并初步建构了“一种崭新的生态世界观”^[1],即生态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世界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生态后现代主义诞生于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时期,依靠怀特海过程哲学的理论铺垫和美国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推动,最终形成了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

(一)理论逻辑:怀特海过程哲学的奠基

作为一名“深邃的生态学家”^[2],怀特海创立了被称为“有机哲学”“演进哲学”“宇宙论形而上学”^[3]的过程哲学。怀特海过程哲学经过哈茨霍恩、柯布、格里芬等人的丰富与发展,为后现代主义研究发展开辟了新的论域,成为生态后现代主义探索生态文明的宝贵理论资源。事实上,在怀特海生平的著作中并未明确论述过“后现代”,他本人更从未以后现代主义者自居,但这并不影响后人将其列为后现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思辨形而上学宇宙论中不乏后现代思维。

过程哲学是一种“后现代生态世界观”^[4],这种世界观推崇有机整体理论。在近代哲学中,以笛卡尔为代表的二元论者将物质实体与精神实体分而论之,造成了哲学体系的“不一致性”,这尤其体现在身心二元论的分析上。在这一实体哲学视角下,实体性个体似乎能够独立于其他一切事物而孤立存在。过程哲学的有机整体思想很大程度建立在对实体哲学的批判和修正的基础上。怀特海将矛头直指机械宇宙论,他认为,笛卡尔和牛顿以来的实体哲学的根本性错误在于“误置具体性谬误”,即“以抽象的概念或理论去解释具体的事态,或以更抽象的去解释更具体的,把抽象的概念看作是具体的真实”^[5]。如,基于牛顿物理学的“单纯位置观念”和休谟哲学的“简单孤立印象”都是误置具体性谬误的典型例证,两者将物理学和心理学上的抽象假设为原初的实际经验,把抽象的实体认为是现实实有,显然把具体性放错了地方。在以笛卡尔、牛顿和休谟为代表的实体哲学看来,孤立的、不变的实体将有机整体的世界分解得支离破碎,整个世界走向了悲观和虚无。然而,怀特海指出,实体之间“显然是联系着的”^{[6]14}，“每一现实实有都存在于一切其他现实实有之中”^{[6]81}。笛卡尔等人并没有把事物联系起来,而是以抽象的哲学理论对事物的关系进行讨论,难以深入到事物本质中,玩弄抽象概念并不能克服“具体性误置”所引起的混乱。怀特海为了说明事物之间的有机整体性,提出了由实体思维向事件思维转向。所谓“事件”就是自然之中实际发生的事情,怀特海把“事件”视为宇宙原初构成,人作为事件的存在参与宇宙进程。宇宙如同一张大网,现实存在的事物不过是这一网络中微小的组成部分,不过是宇宙演化过程中的某一经验事件。每个实体同时作为独立事件在不断摄入经验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存在,在不断地与周围的事物产生关系的前提下经验性地生成,构成了宇宙这一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网络。同样,“自然是作为事件而呈现的”^{[7]13},事件是首要的实在,可以说我们认为是实体的东西都可以归结为事件中复杂的结构。当自然被视为纯粹的物质实体而不是一个事件的时候,致力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克服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那么,人们首先根据事件思维来认识世界的时候,一种非二元论的观点也就顺理成章了。

过程哲学将复杂的物质客体分解为较小的客体,也将复杂的事件分解为它借以构成的较小事件。当复杂事件达到无法细分的某个点,也就达到了那些不能被进一步划分的、较小的事件。这些较小的事件就如同宇宙大网中的任一结点,瞬间的人类经验就是这样一种事件,怀特海将其理解为“现实境遇”,“最好是被理解为它们与其他事件的关系的综合”^[8]。事件显然不能成为实体,实体是不变的、静止的、不可分的,而事件是流动的,它不可能孤立存在。作为最小单位的事件,现实境遇的发生也是绵延的而非瞬间的,“因为空间和时间本身是事件的抽象物”^{[7]65}。一个事件(无论大小)不仅同当前事物发生联系,与事物过去的经验也密不可分。事件思维承认现实境遇是各种关系的综合,不能脱离关系而存在,各种现实境遇具体统一于整体的演化之中,“不可能有不属于具体统一体的‘多种事物’”^{[6]326}。由于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创造性,任何相对完成了的

现实机缘都是产生新事件的材料,世界的发展因此表现为动态发展的集合体。既然事件处在不断生成的流动过程中,既然事件不可能脱离其他事件而存在,那它必然具有普遍相关性。宇宙中不可能存在完全独立的实体或“自包”的自我,一切事物都是在关系中存在,依靠关系来维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可以说,每一个事件都体现在每一个其他事件之中,每一个其他事件都是每一个事件存在的条件。如此,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可以是生态学意义上的存在,人类本身作为共同体中的人的存在也是生态学的^[9]。言外之意,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看似是两个不同的系统,但这两个系统又统一于更大的共同体之中,表明人与自然以共同体的形式融入宇宙整体进程中。

(二)问题逻辑:生态环境问题的追逼

西方现代化进程将人类社会的发展推向了极限,加速了共同体的瘫痪,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极度分化,“现代性”巨轮已经劣迹斑斑。尽管现代统治者和思想家也在不断反思和变革中维护现代性“最好的状态”,但只是从经济调控、文化调和以及社会公共政策制定等方面进行过理论层面上的探索,并未深入实际活动,始终难以有效抑制现代性状况的恶化。在生态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现代性是造成生态环境问题恶化并演变为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个人主义、机械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父权制和军国主义”等现代性标签词都体现了一种“非生态”的霸道思维,这种霸道不仅表现为人对人的压迫,同样也体现在人对自然的压迫,更突出地表现为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性。人对自然的霸道行径导致我们对地球的破坏是史无前例的。现代性社会中“身体被看成一架生物机器,自然界被看作仅仅是现代经济的外壳,地方观念成了世界主义者眼中未开化之物”^{[10]2},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亲密的关系逐渐被噩梦般的现代性所替代,人类不仅脱离身体、自然的限制,也不断逃离自己的家园,人类生态感受性被削弱。个人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盛行。现代人始终保持超高负荷运转,作为经济机器中的部件,人类异化为经济人,成为缺失情感的经济工具。人常以“万物的尺度”“自然的主宰”自居,培根所言的“知识就是力量”更是激发了人类“唯我独尊”的狂妄心理,统治自然、超越自然、驾驭自然成为现代人梦寐以求的事情,逐渐形成“祛魅”的世界观。因此,人们走上了恣意妄为的“发展”道路,大肆掠夺自然资源、抢占生态财产,试图将自然全部掏空。

事实上,自然正向人类表达“愤怒”。正如恩格斯所言,人类不应沉醉于征服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1]559-560}。但人类依然置若罔闻,肆无忌惮地开荒毁林,毫无节制地开采生态资源,这种竭泽而渔的方式远超自然界本身的承受能力。同时,人类生产生活排放的废水废料废气已经远远超过了自然的自我净化水平,长时间的“三废”污染造成河流中的生物多样性锐减、空气质量下降、地球大气臭氧层受损等。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预示着生态危机的来临,生态危机是具体的也是历史的,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既然现代性社会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同时生态危机态势难以在短期内遏制,那么寻找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之路就十分有必要了。生态后现代主义“将生态主义维度引入后现代主义中”^[12],试图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后现代生态文明之路。

(三)实践逻辑: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推进

生态女性主义运动超越了以往女性主义运动单纯追求个人权益的狭隘性,与其他女性主义运动最大的区别在于强调妇女与自然的天然联系,它是妇女解放运动和生态运动结合的历史产物。极度现代化的社会可以说是极度男权的社会,妇女为了自身的解放掀起了多次斗争浪潮。斯普瑞特奈克强调,“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13]62},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权文化不仅伤害了女性、更伤害了自然。于是,环境问

题也就成为女性主义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关键是反抗父权制世界观的统治。在现代社会中,父权制已经为多种形式的表象所掩盖,但究其根本并未摆脱歧视女性、迫害女性的本质。随着男性中心、机械二元论、分析性科学世界观的进一步巩固,女性和自然同时遭到压迫,男性主导的社会已经病入膏肓,女性和自然被视为男性的奴隶或附庸。为此,生态女性主义者极力证明妇女与自然的天然联系,着眼于妇女与自然的有机整体性。一方面,他们在理论上强烈批判父权制。父权制本身带有分裂的气息,导致男性与女性、人与自然的对立,父权主义是“统治性的并且喜欢建立在自然的解体和妇女的屈从基础上的‘进步’”^{[13]64}。父权制的概念框架可归结为三个特征:一是等级价值观,将包括人在内的事物划分为三六九等,任何事物都有高低之分、贵贱之别;二是价值二分论,两性之间是对抗的而非互补的、排他的而非兼容的,把更高的价值或地位赋予两性中的男性一方;三是统治的逻辑,以传统伦理价值观为前提,论证有价值的统治者控制无价值的被统治者的合理性^[14]。父权制对女性和自然的危害程度不言而喻,并随着现代经济、科技的发展不断加深。另一方面,他们强调女性与自然更为亲密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者声称,“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由大地构成的,大地本身也是由我们的身体构成的……我们就是自然,我们是了解自然的自然”^[15]。生态女性主义主张在前现代的古老智慧中寻找人与自然的有机整体性,相信关爱自然与关爱女性具有相同的意义。女性以血肉之躯生儿育女,将食物转化为乳汁喂养婴儿,自然则不断产出丰富的物质,并提供一个复杂且兼容并包的生物圈。从某种意义上看,女性更能够感受自然,倾听自然,所以生态女性主义运动必然要把解放自然纳入实践目标。

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更多表现为妇女对绿党政策和绿色运动的青睐。当女性主义者意识到生态危机的紧迫性,将生态学引入女性主义运动的时候,生态女性主义就不再仅仅是一个理论,而是一种关怀女性和自然的实践活动。生态女性主义者参与政党活动,担任绿党议员或者顾问,亲身参与绿色运动,无不体现了他们可贵的实践精神,也正是在这一实践过程中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碰撞出生态火花。可以说,“要使任何一种可行的后现代性变为现实,即实现向未来的任何质的飞跃,都必须依靠妇女运动的深厚力量”^{[16]120}。生态女性主义和生态后现代主义两者必然有相同之处,但不能将它们简单等同起来理解。生态后现代主义作为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范围更广、内容更为丰富,而生态女性主义不过是生态后现代主义当中的部分内容,在多元交融的当代,生态女性主义汇入生态后现代主义的思想长河之中,对生态后现代主义的总体形成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二、生态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意蕴

作为一种具有生态底色的后现代主义,生态后现代主义突出表达了四重生态意蕴,即根植于整体主义生态思想,注重整体内部的和谐共生,培养对自然复魅的生生意识,探索以共同体福祉为核心的生态经济学推进方案。

(一)根植于整体主义生态思想

生态后现代主义注重万物一体的整体逻辑,相信现实实有之间的普遍联系,极力消解人类中心主义,以一种“彻底的非二元论”思想来反抗现代性世界观的对立和分裂。

首先,强调“联系是一切事物的本质”^[17]。宇宙万物是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认识活动中的主体与客体都是过程现象,他们在相互制约中不断发展。作为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之一,生态后现代主义强调人与自然有机联系的含义,也强调人与自然关系中各类要素的整合,淡化人与自然之间的主客关系,指出人与自然互为主体,共存于动态联系的宇宙共同体之中。自然界与人类社

会相同,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物质发展过程,自然系统是有规律的、辩证的、充满联系的历史过程^{[7]2}。生态后现代主义指出,所有自然存在物都是动态联系的实体,事物之所以存在是因其处于生成的过程中,这种联系是固有的、客观的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时,怀特海在《自然的概念》中引用“事件-粒子”来定义事件存在的最小极限,事件的各个要素与时空运动不可分割,事件的流动构成时间的概念,事件之间的兼容广延形成了空间,时间、空间融汇于“事件之流”。人的社会属性规定了人依附于社会环境而存在,人的自然属性限定了人不可避免地生活在自然环境中,人的社会价值必须在承认自然价值的前提下得以体现。可见,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在整体主义视域下才会被视为现实实有的事件,这些“事件”不断地被感受、经验、反映,从而形成了有机联系、万物一体的后现代生态文明。

其次,消解人类中心主义。在人类中心主义看来,具有意识的人处于主体地位,而自然是空洞的客体。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人类的实践能力和认识水平显著提高,“人才有能力完成越来越复杂的动作,提出并达到越来越高的目的”^{[11]357}。现代科学的发展给人类发展带来无限的可能,人们相信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支撑人类在地球的绝对统治。具体而言,身心二元论导致了人的身心分离,助长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嚣张气焰。斯普瑞特奈克通过阐释“认知的身体”“创造性的宇宙”和“复杂的地方观念”来呼吁人们消除对自然的漠视,感受自然的真实和亲切。在生态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世界上的事物本无主体与客体之分,人与自然的关系属于主体间的关系,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可以与人发生能动关系。当前,生态危机成为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人类中心主义其实是夜郎自大,故步自封。尽管人类已经意识到生态危机的严重性,人类中心主义的势头也有所遏制,但生态危机不会马上消失,自然对人类文明的报复可能远大于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只有重新审视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坚持万物一体的有机整体论,才能打破人类对自然恣意妄为的局面,唤起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善”。

再次,奠定“彻底的非二元论”基调。笛卡尔认为,世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独立实体,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毫无关联,互不影响。自然与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一认识切断了人与自然的联系,进一步深化了二元论的思想。但生态后现代主义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经验的产物,每一个现实存在都包含了精神形态和物质形态、过去和现在的形态,是摄入点滴经验的生成过程。人和自然的生成就是经验事件生成的过程,也是两者颀颀发展的过程。想要真正认识人或自然,需要把握其以往所有的经验,而这些经验共同作用在人与自然的生成过程中。人与自然则在不断摄入经验中相互依存,相互发展。斯普瑞特奈克也明确提出过彻底的非二元论,即“人与其他实在物从本性上讲是自主的实体,他们以某种与他物相互依赖的关系而存在……存在是统一的整体”^[18],人与人之外的自然物也是不断经验的、联系的整体。“有机”“整体”“内在联系”无不表明人与地球甚至宇宙是一个流动的、完整的整体,“我们不仅包含在他人之中,而且包含在自然中”^[19]。生态后现代主义把人与自然重新拉回到并肩前行的道路上。这种整体主义论调让生态后现代主义者能够走得更远,思考的范围也更广了。

(二)注重整体内部的和谐共生

生态后现代主义勾勒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后现代图景,将心灵寄托于山水,向往田园牧歌式的悠然生活。人与自然共同体内部是平等的、和谐的共生关系,在内部和谐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实现后现代生态文明的道路。

首先,明确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后现代生态文明语境中的自然事物同样具有主体思维,人类虽然看不到或者感受不到,但不能否认自然的主体性意识。一方面,人与自然是平等的生命主体。生态后现代主义者把上帝的爱带到了人间,他们关心一切受造物,认为人与自然没有所谓高

低之分,人类无权以主体的姿态对同是主体的自然进行破坏。当“谈到人类与非人类世界的共同受造物关系,人类和其他物种是没有区别的”^[20],柯布认为,人类与自然事物都属于受造物,上帝只是赋予了人类更多的特殊性。人类世界与非人类世界的连续性、相关性才是上帝造物的永恒真谛。另一方面,人与自然是平等的价值主体。生态后现代主义认为,一切可以感受经验的现实实有就会有内在价值,人以外的自然物也具备感受经验的能力。然而,现代世界观普遍认为,只有人才能具备这种感觉,才能够去经验,才能具备内在价值。怀特海进一步指出,只有所选择的永恒客体才会被既定主体感觉到,而永恒客体之所以能够永恒存在,是因为其能够不断被感受,从而进入特定主体并不断生成新事件,最终表现出具有内在价值的主体形式,且“那些没有被感觉到的物体却不能被忽略”^{[6]67},无论多么细小和微弱的现实实有,都有其自身的主体形式,具备内在价值。可见,“人不是世间唯一的主体,自然也是主体”^[21]。

其次,厚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基础。生态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大都是“操心之人”^[22],他们是一些严肃的思想家,更是操心生态环境、担忧人类命运、温和的“苦行者”。第一,把怀特海过程哲学作为生态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根基。生态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大多为过程哲学家,且具有一定的师承关系。他们以“怀特海哲学为思想资源,探索有机论世界观,重新诠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甄别现代主义的盲点,洞见后现代社会的新存在方式,并以怀特海的生态哲学为思想基础,诠释生态文明及其前景”^[23]。第二,借鉴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斯普瑞特奈克表示,生态后现代主义在关注自然精妙的过程上更贴近中国老庄学派,在倡导培养道德领袖、承担人类对更大生命共同体的社会责任上更贴近孔孟学派^{[10]5}。生态后现代主义者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生态思维进行学理挖掘,值得注意的是,生态后现代主义的自然观与中国古籍《易经》所蕴含的观念如出一辙。第三,挖掘并汲取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柯布、格里芬、克莱顿等生态后现代主义者常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声称生态后现代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思想。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演变为“危及人类生存的‘致命弯道’”,“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个自然的新陈代谢的断裂”^{[24]194-195}。同时提出了“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建设性的观点既是建立于过去的历史基础之上又能提出通向未来的新路径”^{[24]104},这个新路径就是开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后现代生态文明。

再次,展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人类文明。现代性社会的发展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人们一味地向自然索取,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某种平衡。生态后现代主义者所勾勒的生态文明美好图景包含了世间万物的和谐共生,包括由共同体组成的共同体的和谐共生,这就要求所有类型的共同体既要保证外部关系的平衡稳定,又要保证内部各个部分、要素、环节的平衡发展。同时,生态后现代主义并不否认人类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而是强调个人利益实现的前提和结果是共同体的发展。现实实有的主体是有感觉的物体,“一种感觉不可能脱离容纳它的现实实有”^{[6]339}。每个感觉性主体都有维护自身权益的需要,那就不能否认非人类事物的内在价值和主体需求。但也需要注意,人类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必须对他人和自然环境给予应有的关切,不能以牺牲生物圈中“他者”的权益作为获取自身利益的条件。此外,生态后现代主义者极其推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方式——“诗意的存在”^{[25]23-29}，“我们必须轻轻地走过这个世界，仅仅使用我们必须使用的东西，为我们的邻居和后代保持生态的平衡”^{[16]217}。

(三)培养对自然复魅的生生意识

“生生”指生命的延续、共同体的繁荣。整个世界是一个由共同体构成的共同体,人们只有从祛魅的世界观里清醒过来,重新建构一个复魅的世界秩序,培养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敬畏科技的生生意识,人与自然共同体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生生不息,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长久的和合

与共。

一是保持对自然的敬畏。早期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出于无知,宗教迷信拥有对自然的解释权,知识水平限制了人们对自然的了解。现代社会对自然的敬畏却是出于无力,生产力迅速发展却难以抵御生态灾难、治愈生态创伤,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让人类不得不进行深刻的反思。生态后现代主义者呼吁人们保持对自然的敬畏,尊重自然,爱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这里的敬畏是作为地球共同体成员的主观能动性的人的义务。生态后现代主义者对自然的敬畏受到共同体思维的影响和实践经验的启示。共同体思维的要旨是尊重共同体利益,而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共同体利益的重要内容。“每种东西都具有自在、自为的价值和重要性,没有任何东西是仅仅从我们的目的看才有意义的,每种东西都理应受到尊重。”^[26]自然界的空气、阳光、河流等要素都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无论人类再怎么发展,都无法摆脱自然因素的制约。因此,生态后现代主义者反对人类大肆掠夺自然资源和任意改造地球的活动,欣赏道家的“顺其自然”和“无为而治”。同时,生态后现代主义者致力于生态文明的探讨,关注历史,也关心人类的未来,对自然的敬畏之心贯穿于他们的事业之中。面对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现状,他们不仅在理论上表达了对自然的敬畏之情,而且在美国加州的克莱蒙地区打造了展现后现代生态文明景象的生态小城。

二是保持对生命的敬畏。人类为了生存,一直与自然进行抗争。然而,人类步入现代文明后,开始反叛附魅的自然,忽视自然规律的制约。传统的生命伦理始终执著于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而生态后现代主义者强调敬畏生命则是把传统生命伦理的道德标准、行为规范进一步拓展到非人类的生命体之上。实际上,对自然复魅的生生意识深植于生态后现代主义者心中,敬畏生命等同于敬畏生命伦理,生命伦理强调世间万物的生命形式皆为合理存在,应平等地受到尊重,生命的恒久运动遵循自然规律,如同四时之永恒,生生不息、生生不止。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都具有自身的生命形式,生命伦理不仅存在于人类社会,也适用于自然界中的动物和植物,对待任何生命形式都必须保持敬畏之心。当前,现代性问题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枷锁”,现代性社会毫无节制的发展已经引发了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地球生命系统正在承受巨大的压力。格里芬认为,人类必须意识到现代性的严重缺陷,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27]19}。汤一介对生态后现代主义复魅的自然观作出高度评价,称他们所构建的后现代生态文明使“所有生命共同体都能得到足够的关心和重视”^[28]。不惟如此,为了培养、固牢现代人的生生意识,生态后现代主义引入了自然主义有神论,在泛经验论的基础上赋予非人类生命以神的特性,利用宗教功能教导世人构建生命共同体,树立生命平等观,敬畏世间一切生命。

三是保持对科技的敬畏。在生态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科学的复魅即对科技的敬畏,对科技的敬畏也是对科技伦理的敬畏。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现代文明的前进,自然的神秘面纱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被一层层揭开,时至今日,自然仅成为了人类眼中待开发的资源,人们相信自己可以依托科学技术征服自然。事实并非如此,技术的滥用给人与自然带来的伤痛比比皆是,核武器时刻威胁着人类的安全,人类精神文明和道德伦理受到严峻挑战。人类不仅没有通过技术掌控自然,而且可能危害自身。现代科学家和哲学家们把现代性的祛魅世界观当作了科学进步的需要,甚至说“科学必然使世界祛魅”^{[27]8}。这种祛魅的世界观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体现为无视科技伦理规范、肆无忌惮地挑战自然、对未知嗤之以鼻。对此,生态后现代主义对待科技发展持审慎的态度,对人类通过技术统治自然、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指出现代技术会导致人类面临更大的生态危机,不加节制地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是核武器,会让整个地球陷入恐慌,人与自然关系更难以调和,所以“要提倡使用小规模、更分散的、更易懂的和危险性更小的技术”^[29]。不言而喻,生态后现代主义强调科学的复魅,终究是要强调对自然的复

魅,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并进,生生不息,同时呼吁人们尊重科技伦理,对科学技术心存敬畏。

(四)探索以共同福祉为核心的生态经济学推进方案

现代经济主义把财富的增加视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药方,而生态后现代主义发展出了与现代经济针锋相对的稳态经济——“治疗增长癖的后现代良方”。稳态经济又称共同体经济,是演化经济学的典型理论,该理论从物质能量交换转化的视角,阐释一种“稳态的、可持续的、非增长”的绿色发展观。人类未来文明是追求财富还是增进共同福祉成为了后现代生态经济学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一方面,生态后现代主义者赫尔曼·达利主要用物理学熵增定律对后现代生态经济学进行阐释,批判以增长为目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生态破坏性。在热力学的熵增定律中,热量从高温物体(低熵)流向低温物体(高熵)是不可逆的,有价值的自然资源(低熵)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转变为废弃物(高熵),这一过程也是不可逆的。按柯布和达利的观点来看,“我们拥有两种终极自然资源——太阳和地球”^{[30]12}:太阳能相对无限,人类需要更先进的科技力量才能利用更多的太阳能,因此人类对太阳能的使用流量有限;地球上的化石能源等不可再生资源的总量有限,却很容易获取,因此,流量相对无限。流量“实际上是一个低熵原料转换为商品并最终成为高熵废物的过程”^{[31]43-44},流量以衰竭为开端,以污染为末端。宏观经济学的主流课本往往忽略了环境、自然资源、污染与耗费之间的关系^{[31]64}。现代主义经济以牺牲自然环境来谋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至于创造财富的手段及其后果似乎没有那么重要。因此,现代经济主义忽视自然资源在经济生产中的影响,“流量概念在经济学家眼中的缺失意味着经济的运行没有与环境进行交换”^{[31]47},意味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背道而驰。如果太多的低熵物质被人类经济增长所消耗,抑或原有平衡的低熵物质分配模式被干扰,共同体复杂的支撑系统将开始瓦解。当前,人类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由环境的再生力和吸收力所决定的生态系统承载力,不可避免地引发生态危机。在达利看来,人类社会的经济总量是恒定的,但随着维持商品活动的物质能量和资源流量在物理规模上不断增加,环境污染将不断加剧。当然,生态后现代主义者对待未来的态度是积极乐观的,他们相信“获得可持续性所涉及的技术和经济问题并不特别困难”^{[31]316},人们沉溺于盲目追求增长和科技的无限发展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症结所在。只有抑制科技无序发展、合理利用科技,才能够使生态系统的最大承载力大于经济增长所消耗的环境再生力和吸收力,这样的情况才可以称为“稳定状态下的经济”。

另一方面,生态后现代主义倡导的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体现为以共同体福祉为核心的生态经济学。现代经济的无限增长模式忽略了有限性、熵和生态的相互依赖性,也就忽视了共同体的利益。因此,生态后现代主义提倡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学,即具有“稳态经济学”意味的共同体经济。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学者很难给共同体经济下明确的定义。在柯布看来,“共同体经济强调每个人的内在价值;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性;创造性;超越与超越的极限;人与自然关系的连续性;奋斗目标之可能的共生”^[32]。现代经济理论把人视为“市场中的个体”,而生态后现代主义的经济理论把人视为“共同体中的人”。生态后现代主义者关注“他者”的感受,“关心的是小型的、亲密的、人与人相互联系的共同体”^{[30]176}。事实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3],自给自足的个体并不存在,“我们是在关系中产生并通过关系而存在,离开了这些关系我们就没有身份”^{[30]166}。人与人、人与自然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自然环境的好坏也是评判人类生活美好与否的重要尺度,正因为我们是生活在共同体中的人,任何人对环境造成破坏都是对共同体福利的破坏,“我们要认识到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的福利是由每个人的福利构成的”^{[30]170}。柯布甚至认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放弃 GNP 来实现共同体

经济的发展,提升共同体的幸福感^[34]。生态后现代主义的经济方案持典型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论调,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立场上更侧重传统文化的复归,培养人们的生态情怀,以此构建追求共同体福祉的后现代生态文明经济。

三、生态后现代主义的当代反思

生态后现代主义为我们指明了万物一体、和谐共生、为自然复魅的生态文明之路。这条道路以批判现代性社会为主线,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后现代生活方式,旨在展示一幅生态文明的后现代主义图景,诚然,这种文明形态对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神学色彩、资本逻辑思维、乌托邦式构想使得生态后现代主义不可避免地存在其理论困囿。

(一)浓厚的神学色彩

生态后现代主义的世界观离不开宗教的参与,怀特海、柯布和格里芬等人都具有深厚的宗教情缘,他们整个理论体系都充满浓厚的神学论调。

首先,生态后现代主义不反对宗教信仰,而是试图拯救上帝,复兴基督教。生态后现代主义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同时,结合西方文化视角对天(上帝)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企图通过有机哲学的理论刻画“纯爱的上帝”,从而复兴基督教,拯救已死的上帝。他们只是反对西方传统宗教(基督教)的“唯一的中心”和“单一的视野”,即反叛传统宗教极权主义带来的绝对基础。依生态后现代主义者来看,宗教应该是开放的、多元包容的体系,朝后现代方向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流变后的上帝更为具体,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降临人间来关爱世人的神。有机哲学认为,世界上不存在无中生有的东西,万事万物均是由某个现实实有引起的,是由过去某个现实实有流变后的合生。其次,怀特海以形而上学的西方哲学特色,说明上帝是原初的创造物,这种原初物是具有创造性和后继性的,正如大自然的事物,是处在流变的过程中,呈现出千变万化的形态。上帝既是宇宙的开端,又是终结。所以,达利感叹道:“上帝所创造的具有创造性的进化过程比创造静态的生命形式更让我感到敬畏。”^{[31]307}怀特海指出:“如果没有上帝的作用,现实世界中的未实现的永恒客体对有关的合生来说就是非存在的了。”^{[6]50}最后,生态后现代主义者需要宗教信仰来支撑未来预言,他们的生态经济理论把可持续发展与宗教联系起来,试图借助神学来减少理论理解的困难,增强理论说服力。达利坦言,虽然稳态经济学的可持续发展观“不一定非要有宗教内涵,但它对那些把自身看作是生物而非造物主的人来说更容易理解”^{[31]308}。此外,柯布、格里芬等人的家庭宗教背景不容忽视,他们对基督教深厚的感情渗透在字里行间,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本身就是宗教性质的哲学。怀特海的宇宙论包含了科学哲学和宗教哲学,“上帝在二者中都起了作用”^{[35]37}。诚然,上帝的形象影响深远,在事物流变的过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重塑上帝更有利于生态后现代主义者在民众尤其是基督徒中站稳脚跟,但也深埋下了唯心主义的种子。

(二)资本逻辑的思维桎梏

生态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西方绿色思潮中一支前卫的思想劲旅,最终要解决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寻找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路径,但始终摆脱不了资本逻辑的思维桎梏。

一方面,生态后现代主义者有意避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生态后现代主义者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但并未对资本主义生产逻辑进行有力批判,也就难以揭示现代性社会的生态危机根源。他们将“现代性”这一模糊的概念作为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指出了人类中心主义、机械主义、消费主义等生态危机的表面原因,但未能深入系统地对真正的根源

进行探讨。林恩·怀特将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追溯到《圣经》中若隐若现的人类中心主义,柯布认为这种论证是有说服力的,在根本上是正确的^{[35]102},并进一步指出,“机械主义世界观是危机产生的始作俑者”^[36]。斯普瑞特奈克在《真实之复兴》中论述了现代性带来的心灵创伤,从身体、自然和地方来阐明现代化以后的社会现状,表明人与自然关系的疏远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达利为生态后现代主义提出了共同体经济理论和实践方案。但他们均未涉及资本主义最为致命的部分。另一方面,生态后现代主义的生态文明远景构想,不过是其为应对生态危机和挽救资本主义发起的一场温和的“救赎”运动。实际上,这种后现代生态文明并未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他们只能通过“温和的苦行”来影响民众。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无非是围绕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矛盾。无论是哪一种社会形态,我们都能从这两对矛盾中找到问题的根源。马克思早已洞见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家在占有社会绝大多数生产资料的基础上,残酷地榨取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以实现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同样,为了创造更多的利润,资本家会毫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最大化地利用自然资源。在资本逻辑的束缚下,人和自然不过是生产环节中的“客体”部分,或者说人和自然被物化为生产工具或者生产手段。显然,坐拥资本的人最反感的就是反对资本,存在了几百年之久的资本主义不可能轻易地自我否定,更不会推翻已经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正如达利与柯布所言,“数个世纪之久的旧的思维定式不会轻易让位,特别是当所有有威望和影响力的地方都已经确立这种思维定势之时”^{[30]381}。生态后现代主义者深知在资本逻辑主导下产生的“现代性”问题难以根除,但又不想触及制度的根本变革,所以他们歇斯底里地呼喊,迫切寻找发展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情有可原了。

(三)乌托邦式的未来预言

生态后现代主义的生态蓝图致力于传统农业的复归,乡村经济的主导和小型共同体的联合,试图用“后现代”这一抽象的定义规划未来社会,倾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论调,这些意味着生态后现代主义所勾画的生态文明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乌托邦式的设想和不切实际的期望。

生态后现代主义描绘的生态文明蓝图难以实现。其一,斯普瑞特奈克、柯布、格里芬等人带有明显的反经济(贸易)全球化倾向。生态后现代主义者希望构建“社区共同体”或者所谓的“地方共同体”。斯普瑞特奈克强调,后现代的人要回归到“社区和个人得以舒展的物理场所”^{[10]5},重新肯定“地方”,恢复对“地方”的热爱,携手共建生态社区。柯布认为,“大的就是好的”并未在美国得以证明,应该提倡的是小型的社区共同体观念,他还按照“尊重他者、环境友好,共同利益至上,人与社区共荣”的构想,在美国加州克莱蒙地区构建“后现代之城”。格里芬认为“后现代思想是公共的或社区主义的”^[37],他力图构建某种内部结构紧密的、有机联系的和创造性的地方“同盟”。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已成常态,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历史趋势不可逆转,这种“小的就是美好的”观念在理论上缺少说服力,在实践上难以落实,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其二,后现代主义生态文明主张回归传统的农业生产,排斥集约化生产。生态后现代主义者过分强调农村发展的重要性,倡导大学生与农民共同生活,建立农村社区大学。在他们看来,缓和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紧要任务是发展乡村,或者说建立“乡村共同体”,提倡浪漫的后现代生活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所谓“诗意存在”“创意存在”的后现代生活方式本质上是小农经济思想的再版,深谙生态后现代主义的学者王治河指出,“这样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生活方式一定会被人指责为理想主义色彩过浓,‘不够现实’”^{[25]28}。因此,生态后现代主义勾勒的生态文明社会具有一定的乌托邦底色,“只是一种关于未来的预言”^[38]。

参考文献

- [1] 于文秀. 生态后现代主义: 一种崭新的生态世界观[J]. 学术月刊, 2007(6): 16 - 24.
- [2] 田中裕. 怀特海有机哲学[M]. 包国光,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16.
- [3] 涂纪亮. 美国哲学史: 第 2 卷[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7: 485.
- [4] BIRCH C. On Purpose[M]. Kensington: New South Wales University Press, 1990: 73 - 85.
- [5] 杨士毅. 怀特海哲学入门[M]. 台北: 杨智文化, 2001: 148.
- [6] 怀特海. 过程与实在: 宇宙论研究[M]. 李步楼,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7] 怀特海. 自然的概念[M]. 张桂权,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 [8] 曲跃厚. 过程哲学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77.
- [9] 麦克丹尼尔, 曲跃厚. 生态学和文化: 一种过程的研究方法[J]. 求是学刊, 2004(4): 5 - 10.
- [10] 斯普瑞特奈克. 真实之复兴: 极度现代的世界中的身体、自然和地方[M]. 张妮妮,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 [1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九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2] 王治河. 第二次启蒙[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序言 4.
- [13] 斯普瑞特奈克, 秦喜清. 生态女权主义建设性的重大贡献[J]. 国外社会科学, 1997(6): 63 - 66.
- [14] WARREN K. Ecological Feminist Philosophie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20.
- [15] GRIFFIN S. Woman Nature; The Roaring inside Her[M]. New York: Harper & Row Press, 1978: 226.
- [16] 格里芬. 后现代精神[M]. 王成兵,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 [17] 怀特海. 思维方式[M]. 刘放桐,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12.
- [18] 张妮妮. 身体、自然和地方: 斯普瑞特奈克对生态女权主义的新发展[J]. 哲学动态, 2001(7): 30 - 33.
- [19] 王治河. 别一种后现代主义[J]. 求是学刊, 1996(4): 16 - 20.
- [20] 柯进华. 柯布后现代生态思想研究[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60.
- [21] 王治河. 斯普瑞特奈克和她的生态后现代主义[J]. 国外社会科学, 1997(6): 50 - 56.
- [22] 王治河. 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向度[J]. 中国社会科学, 1997(1): 25 - 35.
- [23] 格里芬, 王俊锋, 周邦宪.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研究三十年[J]. 哲学探索, 2021(1): 1 - 16.
- [24] 克莱顿, 海因泽克. 有机马克思主义: 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M]. 孟献丽, 于桂凤, 张丽霞,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 [25] 王治河. 别一种生活方式是可能的: 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批判及启迪[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1): 23 - 29.
- [26] 格里芬. 后现代宗教[M]. 孙慕天, 译.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3: 248.
- [27] 格里芬. 后现代科学: 科学魅力的再现[M]. 马季方,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 [28] 樊美筠, 王治河. 第二次启蒙的当代拓荒者: 深切缅怀汤一介先生[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1): 5 - 10.
- [29] 戴利, 汤森. 珍惜地球: 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M]. 马杰, 钟斌, 朱又红,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411.
- [30] 达利, 柯布. 21 世纪生态经济学[M]. 王俊, 韩冬筠,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 [31] 达利. 超越增长: 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M]. 诸大建, 胡圣, 等,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 [32] 王治河, 薛晓源. 全球化与后现代性[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87 - 91.
- [3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35.
- [34] 科布, 杨志华, 王治河.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文明观: 小约翰·B. 科布访谈录[J]. 求是学刊, 2016(1): 13 - 19.
- [35] 柯布. 柯布自传[M]. 周邦宪, 译.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8.
- [36] 柯布, 庞宇哲. 走向一种建设性后现代的生态文明[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6(4): 53 - 57.

[37] 佟立. 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研究[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26.

[38] 吴伟赋. 论第三种形而上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研究[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192.

The Formation Logic, Theoretical Implication and Contemporary Reflection of Ecological Postmodernism

WU Yi-sheng, CHEN Yun

(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 China)

Abstract: A unique “ecological” theory has been gradually formed by Ecological postmodernists, through absorbing the essence of Whitehead’s process philosophy, reflecting 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ecological feminist movement. Ecological postmodernism is rooted in the ecological thought of holism, focusing on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elements within the whole, cultivating the continuous reproduction consciousness to realize the re-enchantment of nature, and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economics with common well-being as the core. Some views of ecological postmodernism have certain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owever, there are limitations in ecological postmodernism, such as the traces of theology, the capital logic and the utopian prediction of the future. We should make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se problems in order to have a more dialectical and rational view on the ecological postmodernism and other western ecological thoughts with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ecological postmodernism; 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rocess philosophy; steady-state economy

〔责任编辑:何敏敏〕